

认知文化研究视域下美国“冷战”文化主题评析 ——以《身体掠夺者》为个案

柳 晓¹, 王婷婷² (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 长沙 410073)

摘要:

认知文化研究是认知文学研究的新拓展。它运用认知科学诸多领域的洞见考察文化与心智的联系, 探讨人类的共同认知特点在具体历史时期文化生产中的作用。运用认知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文化模型来考察“冷战”时期的美国文化主题, 可以揭示其背后的认知逻辑。以美国的科幻小说《身体掠夺者》为个案的分析表明: 冷战时期美国生物医学的发展与其背后的政治历史语境共同作用形成的“病毒”文化模型, 激发了人们的文学文化想象, 由此催生出的文学文化叙事作品不仅记录、塑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社会心理, 也成为一种有效的媒介, 使人们可以观察、理解和反思那一时期美国的政治文化症候。

关键词:

文化模型; 美国冷战文化; 《身体掠夺者》; 遏制

Cognitive Analysis of American Culture During the Cold War : A Case Study of *The Body Snatchers*

Liu Xiao¹, Wang Tingting² (School of Army's Political Basic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as an extension of cognitive literature studies, discusses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世纪美国文学战争叙事与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 19AWW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柳晓,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和叙事学研究; 王婷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研究。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mind with insights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explores the functions of the shared features of human cognition in cultural production of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models, the key concept in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to the cultural theme analysis in general and the virus culture in particular as in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 Sci-fi narrative *The Body Snatchers* can reveal the cognitive logic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virus” cultural theme formed with the interactions of American bio-medical science and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has intrigued peopl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The resulting narrative works not only record and shape the American social psychology during the Cold War, but also serve as an effective medium through which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mptoms of that period can be observed, interpreted and reflected.

Key words:

Cultural Model; American Cold War Culture; *The Body Snatchers*; Containment

0 引言

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对话一直以来都引人关注。从 20 世纪 50 年代由 C. P. 斯诺发起的“两种文化”之辩论到当代学者围绕“文化批评”与“认知科学”展开的论争，从某种意义上看都可视为这一对话的不同变体。在文学研究领域，有学者深刻认识到文学研究与认知研究的分隔致使这两个领域都面临挑战（Baetens & Frey, 2014: 93）。他们在与认知科学不同领域的对话中不断汲取灵感，获取新的研究范式，也由此拓展了认知文学研究的版图（熊沐清，2015）。在这一版图中，认知文化研究成为其新的组成部分。通过运用认知科学诸多领域的洞见来考察文化与心智的联系，关注“进化的人类大脑”与“特定文化产生的特定阐释”之间的关系，探讨人类所具有的共同认知特点在具体历史时期文化生产中的作用，可以极大丰富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路径。

作为“迅速发展的跨学科领域”（Lisa Zunshine, 2010: 1），认知文化研究使研究者不仅可以从以往的文化表征中获得新的阐释，而且还能从新的视角分析特殊历史时期特定文化形态的形成，了解其如何与人类心智、类比思维、对世界的具身化感知以及人们对各种表征之情感反应等人类认知特点相关联。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批评与认

知人类学、认知心理学等多个认知科学领域交叉综合，由此产生可以联系外部“文化实践”与“内在心智”的文化模型。这为我们探讨冷战期间美国的文化主题及其意蕴提供了新的路径。

1 “冷战”、遏制战略与美国冷战文化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转向美苏竞争与对抗的两极体制，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冷战”由此开启。冷战既是帝国之间的一场传统的政治—军事对抗，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竞争。这种争夺不仅限于传统安全领域，文学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被严重波及。各类文化实践都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David Caute, 2003: 3）。这与194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密切关联。根据该法令，在一个全面战争时代，处于战备状态的国家必须不断做好准备，利用其所有资源，将其民用和军事机构联系起来，亦即消除这二者之间的界限（Sherry, 1995: 31）。这自然包括文学艺术领域的各种实践。诗歌、小说及文学批评都被认为是能够给国家安全造成真正威胁的力量（Carlston, 2010: 615）。自颁布之日起，该法令对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和国防体系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冷战时期美国的文化自由大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构成了新的文化形态，“不仅从根本上重塑了作家与其公众读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重新定义了支配、征服和从属的模式。实践的领土占领不再是帝国目标，它被文学与文化空间的占领取代”（安德鲁·N·鲁宾，2014: 31）。

在探讨冷战与美国文学的关系时，不少学者基于这个时期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遏制”战略进行考察。“遏制”这一概念最初被作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项动议提出，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的言论（1947）。作为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认为苏联对美国及西方会造成极大威胁。因此，美国的外交重心是要阻止苏联的扩张，而美国所能采取的主要办法则是从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苏进行遏制。凯南的遏制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也对冷战期间美国意识形态的塑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金衡山，2017: 157）。在遏制战略主导下，各种文化手段被用来进行意识形态的输送，文化艺术产品也被作为对外文化冷战的利器。正如托尼·肖

(Tony Shaw, 2001: 59—76) 所言: “所有的战争, 尤其是‘冷战’, 部分都是通过文字和图像进行的。宣传(propaganda, 即这些文字和图像的设计、制作和传播), 成为‘二战’后东西方之间长达 40 年的战斗之核心。”

在研究美国文学与文化如何回应冷战时, 约翰·古萨蒂斯(John Cusatis, 2010: 37) 曾梳理出冷战时期美国文化中的六大主题, 包括遏制文化和遏制叙事、麦卡锡主义、普遍弥漫的恐惧、趋同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起, 以及反文化运动。这一分类虽然比较全面地考虑到了冷战时期美国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之丰富性和多样性, 但是也存在部分重合。比如, 普遍弥漫的恐惧和趋同文化等主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当时遏制战略形成的主导叙事话语影响下所形成的。因此, 在这些文化主题中, “遏制文化主题” 占据主导地位。托马斯·肖布(1991) 曾揭示出冷战期间美国的文学文化生产与遏制政治不可分割的关系; 艾伦·奈达尔(1995) 详细考察了美国文学对遏制政策的阐释。这些研究进一步表明: 冷战期间美国政治外交层面的遏制政策拓展到了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在内的美国文化多个领域。

显然, 遏制是通过“非全面战争”的方式(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些可控制、动员的手段) 阻止对手进一步扩张(张曙光, 2006: 73)。但是, 遏制思想究竟如何发挥作用, 从而得以从美国的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延伸到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由此形成一种主导美国社会的叙事话语?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涉及多方面因素, 但冷战早期认知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兴起与发展不失为其中的重要原因。

2 “冷战”时期认知科学的兴起——连接人文与科学的桥梁

对认知科学发展历程的考察表明, 冷战时期也正是认知科学兴起的时期。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 将 1956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信息理论研讨会视为认知科学兴起的标志, 这次研讨会上有三篇极为引人关注的论文。第一篇是由艾伦·纽维尔(Allen Newell) 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 发表的关于计算机定理证明的“逻辑理论机器”; 第二篇是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rm Chomsky) 概述“三种语言模型”的论文; 第三篇则是乔治·米勒发表的关于人类短期记忆能力的开创性论文。在米勒看来, 那个研讨会使

他坚信，“人类实验心理学、理论语言学，以及各种认知过程的计算机模拟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未来将看到这些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会得到逐步阐述和协调”（Posner & Shulman, 1979: 379）。

米勒的预言几乎在同一时期就得到了某种印证。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罗德·康克林（Harold Conklin）、沃德·古德诺（Ward Goodenough）和弗洛伊德·伦斯伯里（Floyd Lounsbury）等人系列著述的出版标志着新兴的认知人类学或民族语文学领域的兴起。研究人员对生活 在偏远文化中人们关于命名、分类和概念形成能力等方面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收集，然后试图用正式的术语来描述这些语言和认知实践的本质。尽管这些数据显示相关的认知过程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相似的（Martin-Nielsen, 2010），但这些研究促使人类文化学家关注认知科学中的一些见解，提炼出在认知上具有细微差别的文化概念。这类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模型”上（Shore, 1996: 10）。由此，在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图式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模型为研究特定文化中群体高度共享的认知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针对文化模型的界定，不同学者观点不一。比如霍兰德（Holland）和奎恩（Quinn）的定义是：“某一社会中的人们所共享的，预设的、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世界框架，是人们用于解释世界和据以做出社会行动的重要工具”（Holland & Quinn, 1987: 4）；罗伊·德安德雷德（Roy D'Andrade, 1989: 809）认为文化模型是“一个文化群体间共有的认知模型”。但在布莱德·肖尔（Bradd Shore）看来，上述定义太过含混。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心智”的人类学概念，即大脑依赖于一系列外部衍生的模型来发挥作用（Shore, 1996: 10）。在肖尔看来，尽管人脑通常被描述为一个信息处理器，但它也担负着重要的模型生成器作用，“人类既是机会性的和创造性的模型建造者，也是具备精湛技艺的模型解读者”（Shore, 1996: 44）。他的观点表明：构成文化的模型既是客观世界的公共产品，也是存在于群体成员心智中的认知构造。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所能提出的文化模型是无法穷尽的。为此，他提出一套可区别不同模型集合的方法来阐明文化模型的种类及其运作，这包括两种最基本的类别：语言模型和非语言模型（Shore, 1996: 56）。在语言模型的类别中，“叙事是一种更为复杂和重要的文化模型。叙述作为活动与叙事作为结果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使得叙事在语言公式中具有独特的模糊地位”（Shore, 1996: 58）。

根据肖尔的文化模型分类法，冷战期间由美国遏制战略形成的主导性叙述语言

实则构成了占据美国社会主导地位的“遏制叙事”的文化模型。但是,要进一步了解遏制文化模型形成过程中的认知逻辑,则需要将肖尔的人类学观点与认知心理学家莱考夫与约翰逊的心理概念相联系。

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心理概念,即图式的构建要素,从根本上产生于人的身体在世界上的经验(Lakoff & Johnson, 1999: 16)。人类创造意义既通过某些“基本层次”“空间关系”和“身体行动”等基本概念,也通过人类经验和头脑中结构模式之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概念(Lakoff & Johnson, 1999: 16—37)。这些概念对人类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所有个体与文化认知都取决于相同概念原语的重新组合。当这些概念被组合在一起生产文化模式时,它们中的大多数就能够创造各种各样诸如浪漫爱情、社会定型以及其他所有被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概念”(McConachie, 2010: 140)。针对空间概念“包含”的内涵,约翰逊曾从如下五个方面进行了梳理。该研究表明:人类运用“包含”这个概念,正如他们运用“平衡”“天平”“力量”等概念一样,都是用来建构经验的,这属于人类思维与生俱来的功能之一。它源自遗传基因以及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些被人类用来建构经验的具体概念之选择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密切关联。

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文化实践中,由“包含”这个认知空间概念内涵衍生出的文化模型与该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之间具有认知心理上的连贯性。美国“遏制”战略的内涵包括围堵、威慑、胁迫、预防、解放等五个部分(张曙光, 2006: 68)。美国对苏联在全球发展壮大采取的“遏制”,也都不同程度上涉及了这五个方面(张曙光, 2006: 68)。从这个意义上讲,“包含”这个基本空间概念为遏制文化模型提供了“一种默认的认知模式”(McConachie, 2010: 150)。它渗透在“冷战文化”之中,在帮助组织和维护现有的心理图式和文化模型之基础上,甚至塑造了一系列新模型。这些模型都处于冷战模型这一巨大的网络中心,建构了该时期大部分的主流文化。这些模型的产生及相互作用的过程也蕴含着深厚的认知心理学逻辑。

根据认知心理学观点,人类的空間概念和身体行动概念为人们提供的是结构化文化体验,其方式是“类比转移”,即通过相似性来创造连接两种现象之间的类比(Lakoff & Johnson, 1999: 16)。但文化模型不同层次之间的类比转移则是通过肖尔称之为“类比图式化”的方式实现的。在各种类比图式化的方式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将新信息类比似的映射到以前习得的基础图式上进行意义构建;而最罕见的则是建构新

的模型，来解决先验模型缺乏造成的各种不连贯经验。这些新模型中有的可能会成为群体的常规模型（Lakoff & Johnson, 1999: 367）。在这一过程中，类比形成的高层级过程则是文化发挥作用之核心。

下面我们结合具体个案来分析冷战期间遏制文化模型主导下的“病毒”相关的文化主题及其作用机理。

3 美国“冷战”文化主题中的“病毒”模型：以《身体掠夺者》为个案

冷战时期在美国科幻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与遏制、渗透、思想控制、威胁人类等相关的叙事范式，比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冷战早期的这类作品中，外星人主题在原来“低级书刊中的粗俗怪兽”之基础上转化成具有“侵入性”和“威胁性”的外来物种的“入侵”主题。这类“入侵叙事”是在遏制文化模型影响下衍生出的文化模型，提出的都是一种程式化问题——“征服或被征服”（David Seed, 2013: 30），其目的在于建构公众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在众多的入侵叙事中，《身体掠夺者》（*The Body Snatchers*, 1955）独树一帜，一直以来被评论界视为美国冷战早期标志性的文化产品。

小说主要讲述的奇特经历发生地点在美国加州一个假想的小镇桑塔米拉（Santa Mira）。镇上的医生迈尔斯·贝内尔到外地开完医学会议回来，发现小镇最近经历着一连串怪事：来自外太空的豆荚种子从天而降，它们复制人类，在其入睡时以植物替身加以取代。豆荚人表面上看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但只有最亲近的人才可以发现其中细微的差异：豆荚人没有情感。尽管它拥有原人的记忆，但是只能假装具有人类情感和知觉。发现这一秘密后，迈尔斯医生力图阻止这些豆荚人取代人类的计划，来拯救小镇。

在各类阐释批评中，政治寓意成为主导范式，是美国冷战时期科幻文学中外星人作为主题类别范式的延续。但是，与同一时期科幻作品中的入侵主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外星入侵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为一种类似疾病传播的方式。小说中一个普通的小镇成了传染病的源头，家庭被非人类的敌人渗透，就好像新的生命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腐蚀或感染了它的人类宿主。豆荚人就像病毒一样工作，从人类盗走基本信息并且制造盲目从众心理，将普通美国人转变为没有灵魂的傀儡。小说和改编电影的

标题都使用了“身体掠夺”(body snatchers)这个词。这一看似平常的术语背后蕴含着认知科学逻辑。当时对病毒认知的普及为新文化模型的创造和现有模型的转化提供了新的经验领域。

尽管医学与政治的关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细菌战中就已经引人关注,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病毒入侵的隐喻才开始增加。研究表明:在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病毒的相关报道是通过“令人感到神奇”这类语言进行描绘的。但是随着病毒“入侵”隐喻的出现,通过“攻击”“吞噬”或“摧毁宿主细胞”等这类语言的描述,病毒成为“攻击和吞噬破坏宿主细胞的病毒”,是“人类最严重的敌人”,每一种病毒粒子都“渗透”到一个组织细胞中,产生新的粒子,“侵入”邻近的细胞并将它们杀死(Wald, 2008: 170—172)。

这些关于病毒的各种描述背后,暗示着病毒学与冷战政治之间出现的某种概念的交流。对人体而言,随着病毒变得日渐危险、变化多端,病毒潜入人的细胞后会获取人体内的控制机制;对国家而言,外在的力量,比如在美国人眼中的“他者意识形态”,也变得像病毒一样,会侵入国家的神经中枢,威胁并破坏各类信息的传播。

根据认知人类学观点,人类行为的构造体现于三个不同的抽象层次:具体案例、制度模型、基础图式(Shore, 1996: 366)。其中基础图式作为“基础性模型,跨越不同经验领域进行运作,构成群体世界观的基础”(Shore, 1996: 366)。由于“图式本身通过与新体验的相遇而被转换甚至被创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文化知识被创造、被转化和协商。各种不同寻常的经验可能改变旧的文化模型或者甚至创造新的模型”(Shore, 1996: 367)。

冷战期间人们接受病毒文化的心理基础与“麦卡锡主义”肆虐一时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约斯特·梅尔卢曾提到当时的境况:“现成的意见可以每天通过新闻、广播等方式传播,直到它们到达神经细胞,并在大脑……中植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Joost Meerloo, 1956: 47)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渗透到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对各个层面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也为各种文化知识的创造、转换提供了大众接受的心理基础。随着冷战遏制战略的推进,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全面展开,社会和医学方面关于威胁的概念与冷战政治和病毒相关的各类叙事开始产生相互作用。生物医学发展产生的“病毒”概念带来的新体验,在冷战政治话语的作用下被类比的映射到原有的“入侵模型”上,使得新的意义建构产生于有形领地的“入侵模型”

到无形的“病毒传染”模型的转换之中。一些特有的病毒学学科术语使人们熟悉了这类关于病毒、疾病传染的表述，即作为敌人、入侵者的病毒，悄悄地潜入细胞组织进行再生，从而最终毁灭或者损坏被侵入的客体。由此，病毒感染的运行机制被建构性地与政治上的威胁相类比。与病毒有关的主题被赋予了新的解释：在全球范围内新兴的他者意识形态的威胁。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身体掠夺者》正是通过渲染疾病在群体中的传播力量，制造了一种亚流行病学的恐慌。在《身体掠夺者》中，我们可以发现小镇居民恐惧和焦虑的来源虽然是外星的豆荚人，但是，最终使这种恐惧担心成为现实的媒介却来自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内部。亲人、朋友和邻居都变成了豆荚人。他们被颠覆之前都是些善良的人，如和蔼的叔叔、可爱的女老板、灰白头发的图书馆员之类的人物，他们都是在睡觉之时被侵袭的。被侵袭之后，尽管受害者看起来仍然跟以前一样是好公民、好邻居，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邪恶的化身，一种确保复制计划得以取胜的豆荚人。小说借助叙述者的声音这样讲道：“你根本看不到任何区别……从外在来看。但是内在来说，他不是同一个人……他机械地说话……没有一丝情感——一点也没有——只有虚假。”（Jack Finney, 1955: 99, 12, 19）在故事中，豆荚人就是通过这种“隐形”“洗脑”的方式来泯灭美国人的个性、消除人类的情感，达到征服美国和世界的目的。

普莉希拉·沃尔德（Wald, 2008: 172）曾指出，文化层面的传染病比生物层面的要更加可怕，甚至比物理攻击更具有摧毁性。由此可见，这类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诋毁，并非直接从文化的角度来抨击，而是通过一种生物学方面的差异来将“非美国意识形态”妖魔化。那些豆荚人的经历似乎表明：这种转化既可以通过各种病毒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其他诸如思想灌输或洗脑之类的方式来实现。由于这种叙事能够制造出十分有效的恐怖效果，它成为科幻小说的一种典型范式，同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部作品建构了冷战期间公众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它通过将外来意识形态简化为入侵的病毒，在公众之中形成一种恐惧感，而这种恐惧继而成为政治势力加以利用的砝码，由此表明，冷战期间的政治话语从生物医学、病毒学中获得一定启示，与此同时也影响着这一领域。

或许正是因为该故事的医学特征，这部作品与当时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冷战特征不谋而合。芬尼小说中的豆荚人被赋予了一种特性，因为它们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科学的体现，而且关于豆荚人的故事通过不同电影版本的改编、重新讲述也证实了其

持续不断的阐释力。与此同时，该作品面世后广受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激发了“既见证过原子核的威力，也见证过纳粹集中营中生物医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毁灭的那一代人的想象”（Wald, 2008: 159）。特定的冷战政治话语与特殊历史语境下的读者接受心理，使得这部作品在不同媒介的讲述中，围绕病毒、传染相关的各种修辞传播开来，不仅传达了关于流行病的科学知识，而且借助科学的权威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

4 结语

上述从认知文化研究的视域对这部科幻小说的个案分析表明：冷战时期美国生物医学的发展及其背后的政治话语使得“病毒”激发了人们的文学文化想象，由此催生出文学文化叙事作品不仅记录了冷战以来美国社会心理中的各种表征，也成为一种有效的媒介，使人们可以观察、理解和评判那一时期美国的政治文化症候。从这个意义上看，1955年杰克·芬尼（Jack Finney）的畅销书《身体掠夺者》（*The Body Snatchers*）不仅仅是冷战时期美国的生物医学话语、政治话语、社会心理和文学想象等相互影响和交织的典型文学叙事案例，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人文学科和文化艺术生产在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建构国家认同等方面的思考和启示。

参考文献：

- [1] Baetens, J. & H. Frey. *The Graphic Novel: An Introdu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 Carlston, E. G. Modern Literature under Surveillance: American Writers, State Espionage,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J].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010, 22(3):615-625.
- [3] Caute, D. *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4] Cusatis, J. *Postwar Literature, 1945-1970* [M]. New York: Infobase Pub., 2010.
- [5] D'Andrade, R. G. Cultural Cognition [G]// Posner, M.I. (e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9:795-830.
- [6] Finney, J. *The Body Snatchers* [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mpany, 1955.

- [7] Holland, D. & N. Quinn.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8] L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9] Martin-Nielsen, J. “This war for men’s minds” : The birth of a human science in Cold War America [J].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010, 23(5):131-155.
- [10] McConachie, B. Toward a Cognitive Cultural Hegemony [G]// Zunshine, L.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4-151.
- [11] Meerloo, J. A. M. *The Rape of the Mind: The Psychology of Thought Control, Menticide, and Brainwashing* [M]. Singapore: World Pub. Co., 1956.
- [12] Nadel, A. *Containment Culture: American Narratives, Postmodernism, and the Atomic Age* [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3] Posner, M. I. & G. L. Shulman. Cognitive science[G]// Hearst, E.S. *The First Centu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illsdale, New Jersey: Erlbaum Associates, 1979: 371-405.
- [14] Schaub, T. H. *American Fiction in the Cold War* [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 [15] Seed, D.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Cold War: Literature and Film*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16] Shaw, T. The Politics of Cold War Cultur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1, 3(3): 59-76.
- [17] Sherry, M. S. *In the Shadow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30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8] Shore, B. *Culture in Mind: Cognition,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9] Wald, P. *Contagious* [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0] Zunshine, L.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1] 安德鲁·N. 鲁宾. 帝国权威的档案 [M]. 言邓馨,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22] 金衡山, 等. 印迹深深: 冷战思维与美国文学和文化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
- [23] 熊沐清. 文学批评的认知转向: 认知文学研究系列之一 [J]. 外国语文, 2015, 31 (06) : 1-9.
- [24] 张曙光. 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研究 [J]. 社会科学, 2006 (10) : 66-75.